

# 中国近年媒介女性话语的价值症候与思想根源

盖 琪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价值症候,即对于精英女性的过度追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底层女性的习惯性无视,乃至恶意曲解。这种症候的思想根源在于媒介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女性主义性别维度的简单放大和对于阶级维度的过度疏离。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试图打造凭借个人奋斗就能实现女性独立的幻景,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少数女性获益与大多数女性受损。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找回阶级性的女性主义视野。

**关键词:**媒介女性话语;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维度;阶级维度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4)06-0064-09

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媒介场域中,与女性有关的话题和内容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在整体上看,这当然是中国内地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大幅上升的体现。但是,如果深入探究相关媒介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当下的媒介女性话语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颇具症候性的价值倾向,即通过一次次以“女性奋斗”为主轴的叙事过程,打造出一个个以“女性成功”为终局的赋权(empowerment)想象,并以此作为当代女性实现性别正义的最佳路径加以宣扬,鼓励所有女性都将之内化为人生的深层动力机制。上述话语究其根源,是一种试图仅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就彻底解决性别权益问题的论述范式,其不仅内在地包含了专注个体竞

争、回避结构变革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而且也潜在地认同了专注生活性赋权,回避社会性赋权的现代父权制的文化逻辑。结合中国国情来看,这类话语曾对中国内地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进程发挥过积极作用,其历史性的正面意义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就当下乃至未来而言,它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局限性,甚至可能对女性权益的进一步提升造成压制。

## 一、“向前一步”:

### 新自由主义女性话语的核心逻辑

2013年,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作者简介:**盖 琪,广州大学教授,从事文艺理论和媒介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GD24CZW01)

出版了一本自传,取名为《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sup>[1]</sup>在该书中,桑德伯格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她在走向职业巅峰过程中所获得的奋斗经验。该书出版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畅销读物,其中文版亦于2014年在中国内地问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桑德伯格的叙事对于身处全球化大都会中的年轻女性而言,确实能起到明显的激励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对于女性职业能力的认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个人本位的积极叙事其实在无形中传达并强化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特有的圈层和资源意识。换言之,该叙事其实是一份专门提供给“精英”和“准精英”女性的人生指南,它对于阅读对象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职业环境和地域发展水平都有着未曾明言但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而对于大多数无法达到这些“基本要求”的女性来说,它所提出的建议无异于空中楼阁,高不可攀,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她们所面临的更为巨大的生存困境。

对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十分尖锐地指出,桑德伯格所倡导的“向前一步”的女性话语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公司女性主义”。这种女性话语表面上鼓励女性通过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坚韧的个人意志,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商业领域中努力争取职业成功,而实质上则是在主张建立一种“将在工作场所受到剥削、在社会秩序中受到压迫所获得的利益在统治阶级男女之间平等地分享”的当代市场伦理。对于社会而言,它真正的目标在于实现一种包含了少数女性参与者在内的精英统治,以“确保最高层的妇女能够达到与本阶级的男性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最终受益者不过是那些已经拥有较高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女性而已。<sup>[2]</sup>

弗雷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但是,事实上,桑德伯格“向前一步”的论述不仅不是孤

例,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逻辑。历史地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二战后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起挑战,即致力于从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角度切入,努力争取包括性别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再)分配正义。<sup>[3]</sup>在这一时期,欧美女性主义的论域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左翼色彩,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既有框架,重新思考女性权益的实现机制、性别正义与更广泛的社会正义之间的深层关系等命题。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逻辑就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勃兴,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性别维度——例如性别经验的表述和性别身份的建构——上来,而对于阶级维度——例如如何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维护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分配正义——则逐渐失去了兴致。这种变化在弗雷泽看来,其实是一种“从再分配到承认”的逻辑嬗变,它意味着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对正义的诉求”转移到了“对同一和差异的承认的诉求”上来。<sup>[3]</sup>

三十余年来,上述逻辑嬗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欧美社会的主流女性话语。就现实层面而言,欧美的许多女性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从自身所处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发达的社会状况出发去阐释世界,由此对大多数女性所面临的实质问题和所应采取的突围路径都产生了较大的认知偏差,其中最主要的偏差,就是把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提高女性个体收入视为足以提升女性整体权益的最佳方案,而无视在现有结构下,大多数女性其实无从分享全球经济发展成果的严酷现实。<sup>[4]</sup>更值得警醒的是,这种带有偏差的认知理路逐渐被欧美的大众媒介所广泛征引,成为大众媒介对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者们进行想象的主流范式。

对此,柏棣的描述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媒体上所表现的女性主义者就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同:“这种被认同的女性主义者是什么呢?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们衣着合体,表现出特有的气质,生活在名牌之中,环境协调、事业成功、经济基础雄厚;这些女人也有不足,她们好争吵,脾气大,处不好人事关系,而且过于自信。但是这些并不重要,作为女人,是她们生理所决定的,又有谁能改变女性染色体呢?”由此,“女性主义似乎成了热门商品。广告商也在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包装女性主义,从而吸引更多的女性消费者”。<sup>[5]</sup>

柏棣的描述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女性气质”已经逐渐被西方大众媒体生产出来。从价值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想女性气质”等于是在向受众主张两重议程。首先,它等于是主张,女性所遭遇到的性别不平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个人的不懈拼搏来解决。为此,女性需要做到的是,向优秀的“现代男性”学习,充分掌握市场理性,提高自律能力,努力将自身的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sup>[6]</sup>其次,它还等于是主张,女性获得成功和解放的标志就是能够充分享受购买精致商品的自由。而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女性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学会了“对自己好一点”的“现代女性”,而不是一个只会为男人、孩子以及全家殚精竭虑的“高级奴仆”。在此基础上,女性的所谓“坏脾气”恰恰可以被理解为其拥有话语权、敢于进行自我表达的注脚。

应该说,上述两重议程正是“向前一步”论述所包含的动力-奖赏机制。正是基于这两重议程,“理想女性气质”在倡导新自由主义的意义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完美闭环”,从而显示出十分巨大的商业潜力和意识形态保守性:它以鼓励个体奋斗为起点,推动女性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慨然承诺经济地位对于化解性别困境的有效性;然后它又以鼓励

个体消费为落点,推动女性迅速花掉努力赚来的钱,高度赞美消费行为对于实现性别平等而言的象征价值。由此,有能力履行这两重议程的女性就被赋予了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双重优越感。但与此同时,没有能力履行这两重议程的女性,也就逐渐失去了被主流女性话语框架关注和讨论的资格,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呈现为一种“议程冗余”。而在接下来的案例分析中,笔者将会着重指出,这种“双重优越感”和“议程冗余”是如何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当下颇具症候性的媒介女性话语的。

##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 新自由主义女性话语的在地化样本

我们先来看中国媒介场域中有关“成功女性”以及“双重优越感”的话语趋向。显然,在过去的七、八年间,中国内地的媒介场域变得越来越热衷于塑造各种具有强大赚钱能力的精英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社交媒体,基本上都汇入了这场通过生活方式表达女性主义立场的传播热潮。热潮之下,可供品鉴的典型传媒艺术文本既包括电视剧《欢乐颂》《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我的前半生》《都挺好》《谁说我结不了婚》《三十而已》《假日暖洋洋》《流金岁月》《爱的理想生活》,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婚前21天》《我家那闺女》《女儿们的恋爱》《妻子的浪漫旅行》《姐姐们的花店》《幸福三重奏》等数十部视听作品,也包括围绕这些作品进行反复阐发的大量自媒体文章。从视听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们几乎无一不展现出积极融入全球化语境的能力和愿望——她们从工作环境、生活品位,到思维方式、个人成长轨迹,都呈现出与好莱坞影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非常接近的状态:一种可以从容穿梭于国际化空间,积极追求人生目标,大胆表达自我欲望的状态。而从社交平台上,我们还可以看

到,相关自媒体文章在对上述节目进行讨论时,往往会结合节目情境,征引现实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榜样”进行延伸论证,而被征引的“榜样”也几乎无一不是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顶层的精英女性。结合上一节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这类媒介表述与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理想女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因此可以说,这些作品和文章所倾力塑造和推广的,其实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艺术对女性主义者进行表述的在地化样本。

历时地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作为一种形象范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好莱坞主流女性话语的影响。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内地一线二线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中,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基本叙事理念的“美剧”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流行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性与城市》《绝望的主妇》《实习医生格蕾》《傲骨贤妻》等,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中国新生代知识女性的情感结构与性别观念。从时间上来看,这些作品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核心逻辑嬗变背景下的产物,而它们所宣扬的,也正是以个体意识、自律意识、竞争意识和阶层意识为主轴的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话语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有关全球化想象的性别分支,或者说,是中国视角下全球化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是,仅就21世纪的最初几年来看,这种带有舶来意味的女性话语在中国内地的媒介场域中并未获得充分的表达空间。直到约2015年后,基于相关价值系统的本土传媒艺术产品才开始批量涌现,并且接连引发较为强烈的社会反馈。导致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城市精英女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她们基于阶层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公共表达愿望在不断增

强,而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审美文化期待也在不断地注入到媒介场域之中,最终汇聚成为推动“她题材”井喷的社会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就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社交媒体已经发展成为最为快捷高效的传播渠道,而社交意义上的话题性也已经发展成为最受重视的媒介产品属性,这种新的传播生态使得自带“争议体质”的女性主义议题越来越被媒介生产所倚重。

以上是催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形象范型的媒介文化背景。综合来看,当前,这一形象范型对于“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个人主义女性赋权路径表现出全方位的认同倾向,并且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颇具症候性的、以“慕强”为核心的在地女性话语。在这种话语中,女性在全球化大都市中的个体奋斗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性别赋权价值都被过度放大。质言之,由于这种话语实际上承接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现代性的霸权逻辑,所以它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正的女性权益问题和真实的女性群体处境。

例如,2018年热播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和《上海女子图鉴》,就是两部将资本主义父权制现代性逻辑直接平移到了女性话语场域之中的作品。就文本表层来看,二者旨在建构的似乎是“北漂”和“沪漂”女性经由个人奋斗,在国际化大都会成功扎根的过程;而就文本深层来看,二者旨在表述的其实是当代年轻知识女性充分习得经济理性、高度内化竞争意识的过程<sup>[7]</sup>——对于后一种过程进行价值建构,才是两部文本的修辞目标所在,也是两部文本均以女主人公终结高校恋情作为开篇的原因。在此,对于女主人公而言,作别一场无功利的情感,如同交出一份“投名状”,是其告别前现代伦理、拥抱现代伦理的重要象征。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其最为关键的进阶步骤并非业务能力的提高和意志品质的提升,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

市场伦理的顿悟,以及由此对相应行为规则的熟稔。在两部文本中,导致“顿悟”和“熟稔”的关键因素都是从正反两方面被加以表述的:正面的关键因素是一位比女主人公年长的女性,一个“中国版”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她的作用是看到女主人公身上的潜力,为女主人公提供必要的指点,教会女主人公坚持个人奋斗路径的必要性;而反面的关键因素则是若干个与女主人公发生感情纠葛的男性,若干个或平庸或懦弱或自私的婚恋对象,他们的作用是打破女主人公对于感情的幻想,使得女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返回自身,投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人生理路上来。由此,当剧情行至终局时,女主人公的感情归属已然不过是其事业前景的一个注脚。因为经历了全球化都市锤洗的她已经是一个专注于自我发展的“新女性”,她的人生已经不会再被任何违反现代经济理性的“杂音”所搅扰。

应该承认,这样细致描摹当代都市女性形象的作品,如同谢丽尔·桑德伯格的自传一样,对于年轻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它们也确实打造了一种日趋流行的媒介幻景:即在当下,女性面临的困境似乎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体的阶层上升来解决的;每一个当代中国女性,只要肯于积极地进入全球市场体系,努力地坚持个人奋斗的路径,最终就能够坦然分享由精英男性所占据的资源,成功实现女性赋权。如前所述,这样一种媒介女性话语实际上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现代性的霸权逻辑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因此,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推动少数精英女性努力去分食精英男性的“蛋糕”,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下层女性而言,它不仅无法增进其权益,而且还可能恶化其处境。

事实上,更加倾向于阶级分析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已经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全球化不仅没有使大多数女性受

益,而且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敌视女性的制度。<sup>[8]</sup>在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都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的底层劳工、家庭佣人甚至是色情服务提供者,她们长期以来只能挣扎在贫困线上,几乎没有向上攀升的可能。<sup>[9]</sup>与此同时,那些身处全球化大都市中的女性职业经理人们之所以能够“向前一步”,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大量繁重而耗时的照料劳动和家务劳动(当下其实还加上了生育劳动——笔者按)转移到了底层女性身上而已。<sup>[2]</sup>少数女性打碎玻璃天花板,绝大多数女性清扫玻璃碎片——将自身的性别困境通过“妻职外包”和“母职外包”向更下阶层传导,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世界里所谓“性别正义”的实情。

但是,在我们的媒介上,“打碎玻璃天花板”的故事讲得越来越风生水起,而“清扫玻璃碎片”的故事却越来越难觅踪影。当下,中国内地媒介场域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视而不见的普遍风气——就其脱离现实症结的程度而言,甚至比欧美媒介场域来得更为严重。2020年,电视剧《三十而已》和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将有关精英女性的叙事进一步推向前台,也使得内地媒介场域进一步被中产以上阶层女性虚幻的赋权想象所统领。在前者中,我们看到,三位女主人公的家庭背景更为优化,她们都出身于上海和江浙富庶地区的中产家庭,父母身体健康,没有丝毫养老压力。因而她们在年近三十之际需要面对的最大人生挑战,不过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充分觉知,是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欣然冲刺;而在后者中,三十位熟龄女星更是大多早已达到或者接近经济自由的程度,她们在经年巨额的保养投入下,均呈现出远低于实际年龄的容貌和身材状态。因而她们在养尊处优之余需要排解的最大难题,也不过是对女性市场周期的重新确认,是对女性主义与消费主义融合程度的倾力

推进。进言之,在上述或虚构或现实的女性叙事中,真正基于生理和安全层面的压力几乎从未存在过,真正的性别不平等症结也几乎从未浮现过,一切都只是停留于向性别刻板印象“宣战”的层面,而最终的“战果”则是推助“金字塔尖”上的女性们将物质优越感升级为精神乃至道德优越感,借此缔造出当代公共媒介空间中的“大女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女性叙事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机制之间,以及与新自由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体系之间,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同谋而非对抗的关系。因此,如果将这类叙事的风向视为女性地位提高、女性权益提升的信号,那就显然过分天真和乐观了——事实上,对于这类叙事而言,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生活都只不过是镀金时代无关宏旨的背景。正如在《三十而已》的每集结尾处都会出现的小片段一般——在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无对白情境中,一个摆早点摊的三口之家,呈现出一种虽然物质拮据但是心态乐观、情感紧密的气氛。不得不说,这正是—一个典型的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媚俗场景,一种以对生命进行绝对认同为旨归的“大写的牧歌”<sup>[10]</sup>:它带领中产观众,在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的精彩人生进行了细致观摩之后,再对社会底层的艰辛光景做一点滤镜下的短暂俯瞰。而其更为刻奇之处在于,当俯瞰的一方沉浸于自身的情怀回响之中时,被俯瞰的一方却始终没有机会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 三、“阁楼内外的疯女人”： 新自由主义女性话语的议程冗余

至此,我们有必要继续讨论一下当前中产视野中的底层女性形象及其所处的媒介文化位置的问题。从近年的媒介女性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精英女性逐渐在媒介场域中树立起自律自强的新自由主义“大女主”形象时,底

层女性却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一种非理性和反现代的面貌。这使得底层女性不仅在性别的意义上成了全球大都市中产以上阶层女性的“对照组”,而且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个人主义精神议程之外的“冗余物”。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介场域曾经拥有不少鲜活的底层女性形象——反映外来女性务工人员生活的电影《特区打工妹》和电视剧《外来妹》都是彼时显例。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底层女性叙事就从大众媒介场域中逐渐隐没,退缩到少数艺术电影中,成为对中国重返全球现代性代价进行标识的能指。<sup>[7]</sup>近年来,这一情形还在持续恶化。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以底层女性为主人公的大众媒介产品几近消失,而且在有关精英女性的叙事中,底层女性少数时候会被放置于景深处,成为面目模糊的背景;更多时候则会被脸谱化为中国前现代伦理糟粕的“卫护者”,以一种近似于疯癫的状态,反衬出精英女性“自我选择、自我负责”逻辑的现代性价值。

例如,在2016年的热播电视剧《欢乐颂》中,女主人公樊胜美就被配置了一个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非常令人反感的母亲。在剧中,樊母要求女儿按月将工资的一大部分寄回家中,贴补不成器的儿子,由此导致女儿在上海奋斗多年都没有积蓄。此外,樊母还经常给女儿制造各种麻烦:例如,不打招呼就贸然跑到上海投奔女儿,结果在车站走失,差点流落街头;再如,带着老伴和小孙子一起挤住在女儿的合租房里,造成其他合租女伴生活极其不便,等等。而这条情节线的高潮之一,则是当樊父突发急病,需要巨额手术费时,樊母完全不顾及女儿的尊严,在医院就向女儿的朋友下跪借钱。整体而言,重男轻女、懦弱狭隘、缺乏现代社会边界意识与自律意识的樊母被表述为女儿焦虑、痛苦乃至巨大挫败感的核心来源——她阻碍了女儿成为“新上海人”的人生进路,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前现代父权制秩序的“卫护者”形象。

而到了2020年的热播电视剧《安家》中,女主人公房似锦则更是被配置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几乎可以用恶毒来形容的母亲——其非理性、反现代的程度较之樊母更胜一筹。在剧中,房母会追到女儿的工作单位叫骂,会睡在女儿家门口撒泼耍赖,只为逼迫女儿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买房;而当房父意外卷入官司,被债主围攻时,房母同样将女儿当作救命稻草,逼她回家应付债主,解救家人。甚至对于女儿的恋爱对象,房母也是竭尽所能地进行敲诈,只为从女儿身上榨干可能存在的每一分利润。可以说,房母对女儿的寡情寡义几乎达到了疯狂乃至无耻的地步。因此,在全剧临近结尾时,房似锦终于下定决心与“恶母”划清界限,展开了自己新的生活篇章。类似的例子还有2019年热播电视剧《都挺好》中的“母亲”“舅妈”和“保姆小蔡”等女性形象。在剧中,这些中老年的底层女性无一不表现得重男轻女、贪财势利、虚伪粗鄙、缺乏伦理意义上的真情实感。她们作为苏明玉、朱丽和吴非三名年轻的、中产以上阶层女性的“对照组”,与后者自强自立、优雅明理、受过良好教育的形象确实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效果。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极端化的“恶母”(底层女性),她们在父权制的长期规训下,已经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人格异化,因而她们往往会变本加厉地迫害同性别后代,以此抵抗内心作为女性而厌女的悖谬处境。但是,在此,亟须讨论的是,我们的媒体是否有必要反复去塑造这种极端化的“恶母”(底层女性)形象?是否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其作为制约现代中产以上阶层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自由的最大反面力量来加以表述?这种表述比例是否公允?这种修辞落脚点是否合宜?这种叙事范式是否包含了对于社会历史过度的简化和着意的曲解?

质言之,笔者认为,对来自底层的“恶母”

形象的大肆渲染,反映了一种严重误导当下女性问题症结的媒介文化倾向。这类媒介文化倾向将少数全球化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尺,对三、四线小城镇乃至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却完全无视后者经济板滞、福利孱弱的社会现实,以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仍然只能依赖血亲伦理系统来纾解人生重大困境的社会心理根源。换句话说,我们的媒介叙事对于底层女性无法摆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根由,不仅缺乏必要的历史同理心,甚至缺乏基本的历史兴趣。

与此同时,这类媒介文化倾向还回避了全球化大都市对于年轻劳动力的隐性盘剥,即前者为后者提供的薪酬越来越只能维持后者个体的现代化生活,而却越来越不再包含其对原生家庭进行必要供养的份额。因此,即使仅在媒介叙事的层面上,也应该看到,依靠个人奋斗路径进入全球化大都市的樊胜美和房似锦,如果不与其底层原生家庭决裂的话,其实终究是无法合乎逻辑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的——这其中的根源并不在于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而在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框架原本就没有涵纳“独立女性”的反哺需求。这样的话语框架的良性运转,其实是需要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福利建构充分的社会系统作为支撑的。因此,当这种话语框架从发达社会不加改造地平移到发展中社会时,产生巨大的语义撕裂则几乎是必然的。

正是在这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暴露出它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即女性身体经验的同一性其实是无法彻底弥合女性阶级经验和国情经验的差异性的。由此,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必然发展成为一种“排她性”的话语体系,同时必然遮蔽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女性问题的多声部特质。因为,对该话语体系而言,只有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排除在体系之外,使之彻底被指认为现代性议程的“冗余物”,才能保证自身最终呈现出一种可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

所有女性问题的普世魅力。

历史地看,这种以女性话语内部的修辞剪裁技巧其实由来已久。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讨论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简·爱》时就曾经指出,简·爱作为一个“个人化的女性主义主角”,其叙述一方面确乎实现了一种女性声音的自我权威化效果,但另一方面容易被忽视的是,其叙述声音之所以能够走到历史前台,实际上是以遮蔽甚至消灭另一种女性——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玛森·罗切斯特——的声音为代价的,因此其在另一种意义上仍然是“霸权”的,即在凸显性别立场的同时,隐晦地遮蔽了性别内部的种族/阶级差异。<sup>[11]217-219</sup>笔者认为,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下媒介女性话语的症候性颇有助益。如前所述,我们的媒介场域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的热切形塑,实际上正是以对非精英的、非大都市的中下层女性的排斥和压制为代价的——对于中下层女性形象的污名化,实际上正是在制造媒介意义上的“阁楼内外的疯女人”,以此作为“新女性”足以见容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秩序的必要衬托。因为,正是有了伯莎阴森恐怖的狂笑、不堪入耳的秽语以及粗俗野蛮的举止的对比,才使得简·爱那种敢于犯上的语言显得不那么出格并正常化,<sup>[11]218</sup>甚至足以被指认为一种优雅迷人的现代女性气质。

#### 四、余论:重返阶级性的女性主义视野

综上所述,当前,在中国的媒介场域中,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颇具症候性的面貌,即对于精英化的女性个体奋斗路径的过分推崇,以及对于底层女性形象的排斥和扭曲。前者体现为一种可以被具名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女性”的媒介想象,联结着中国认知全球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性别视角;而后者则体现为一种近乎于指认“阁楼内外的疯女人”的舆论冲动,折

射出中国女性话语日趋严重的非历史化和非语境化倾向。

上述症候的思想根源在于对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过分倚重。就中国的媒介现实而言,它实际上正在导向另外一种窄化女性生命经验和生命价值的路径,同时也在加剧女性群体在思想观念上和在现实处境上的两极分化。这是一种虚妄的女性赋权想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责任意识,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性别正义实现的现实进路。

因此,就女性话语而言,中国媒介场域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回到阶级性框架之下,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境况之下的女性地位和状况进行观照<sup>[12]</sup>;进而从过度关注身体经验和身份认同的文化性视野中走出,将更大的精力投入争取社会公正的结构性视野中来。唯其如此,女性主义者才能自信地说:“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女性的理论,还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sup>[6]</sup>女性主义理论所包含的政治激情应该在于,它始终试图“以最好的方式来理解并改善女人、男人、儿童、所有物种以及整个地球的生活”<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桑德伯格. 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M]. 颜箐,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 弗雷泽. 女性主义宣言[J]. 蓝江,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9(7):66-78.
- [3] 弗雷泽.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J]. 周穗明,译. 世界哲学,2009(2):39-52.
- [4] 王丽华. 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女性主义批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
- [5] 柏棣. 满足欲望,自我选择——西方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M]//王丽华. 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女性主义批判.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5.



- [6] 弗格森.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J]. 李泽明. 赵开开,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8(7): 54-67.
- [7] 盖琪. 中国当代媒介场域中的“女性脱嵌者”[J]. 文艺研究, 2019(12): 103-114.
- [8] JAGGAR A M. Is globalization good for women?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1(4): 298-301.
- [9] 王丽华. 发展与帝国——女权主义后发展对全球化理论的定论[M]//王丽华. 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 女性主义批判.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1-24.
- [10] 里卡尔. 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重读米兰·昆德拉[M]//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许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393.
- [11] 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黄必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董金平.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3(5): 5-14.

[责任编辑 林雪漫]

## The Value Symptoms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Chinese Media Female Discourses in Recent Years

GAI Qi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a female discourses in mainland of China have shown an obvious value symptom, that is,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elite women, and the subsequent habitual disregard and even malicious distortion of lower-class women. The ideological root of this symptom lies in the media's recognition of the neoliberal feminist position, and the resulting simple amplification of the feminist gender dimension and the excessive alienation of the class dimension. Neoliberal feminism, on the premise of agreeing with the rule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ries to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women's independence can be realized by personal struggle, and the result can only be that a few women benefit and the majority of women suffer. In this regard, our solution should be to rediscover the class feminist vision.

**Key words:** media female discourses; neoliberal feminism; gender dimension; class dimension